



书评

《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

宋燕鹏，《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ISBN：978-731-31294-2-0

陈爱梅*
(TAN Ai Boay)

在马大读书的时候，很长时间以为只要使用了中、英文双语的原始档案，研究马来西亚二战前的华人历史就可以占尽优势，并以此支撑自己的学术自信。但是最近看到宋燕鹏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才发现学术研究真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虽然他的新书是以中文材料为主，但他按图索骥的热情，解读中文铭刻等一手资料的能力，令人敬佩，这也是这本书的特色及价值之一。

《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主要收录了宋燕鹏在 2012 至 2014 年所写的八篇学术论文；三篇书评和审查报告。附录部份则有六篇在马来西亚报章发表的书评。

他在书中把马来西亚华人史分为三个维度，即：一、社会权威，他选取了马六甲甲必丹和青云亭主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叙述青云亭的碑文，他也针对资料进行量化的研究。宋博士原是治中国古代史，他在 2011 年出版的《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针对中国北朝文士的籍贯进行分析论述，并获得学界好评。他运用他擅长的研究方法治马来西亚华人史，以他对中国籍贯的敏锐度对资料进行详细的分析，这恰好是大部份当代土生的马来西亚华人学者所缺乏的。

于是，他很快地就发现黄文斌博士在 2013 年出版的《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简称《集录》）中籍贯的错讹。他所写的《集录》书评部分内容刊登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书评完整稿则收录在他的这本著作，他高度肯定和赞叹黄文斌收集并出版三宝山墓碑的工作，但他以墓碑上的清代籍贯为例，举出《集录》中搞错的地名，如将福建地名错讹为广东等。读到这篇书评时，我不禁内心慊然，不只是因为这北方书生的性格耿直，也因为《集录》中所提到的瑕疵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由于对中国地理历史的不熟悉，如果换着我来做，我大概上谷歌查一查这些地名，而忽略了中国历史上的地名与当代地名并不能划等号。

* 陈爱梅博士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电邮地址：tanab@utar.edu.my

宋燕鹏博士在马来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拜访了历史系退休教授卢慧玲博士。卢教授拿了一篇在《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学刊》(JMBRAS)刊登的、由 Russel Jones 所写的“The Chiangchew Hokkiens, the True Pioneers in the Nanyang”给看他。宋博士一看论文中关于中国地名的表格,就发现作者是用现在中国的地名去研究19世纪的南洋华人。卢教授顿时发现海外的华人研究问题所在,她立即鼓励宋燕鹏书写一篇福建地名的历史变化,造福更多的海外研究者,以便能更准确地认识历史中的中国。

研究从来就不是一步到位,我多年来在气度宽大、谦卑又严以待己的卢慧玲教授身边学习,总感春风化雨。在《南方大学学报》第一期读到莫家浩对《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所写的书评,认为该书的主要缺点之一在于没有使用英文档案。如此的评语,实为片面,也缺公允。谢文庆、卢慧玲和邱家金等享誉国际的历史学者,他们是英校生,更是驾驭英文档案的高手。他们虽然鲜用中文材料,但这并不能就此评断他们的著作具有重大缺陷。同样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只使用中文资料的书籍是有缺失的。宋燕鹏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正是提供了这样的论证。他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的熟稔,正是弥补了我们的不足。值得肯定的是,宋燕鹏于马来西亚华人的研究,也使用了非中文的资料和档案。

这本书的第二个维度是华人社群,作者选择了吉隆坡福建人为研究对象。由于参与了马大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的福建义山计划,使他有使用雪兰莪福建义山二战前的收据和会议记录,并且完成了几篇论文。他统计和分析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梳理出福建省人的府/州籍贯分析,并得出结论:20世纪30年代的在吉隆坡福建省人中,超过80巴仙是闽南人。在马来西亚,“福建话”指的是闽南话,福建人指的就是讲闽南话的人,这有别于讲闽南语系的福州人。闽南等于福建?一般学者都认为因为马来西亚的福建省移民以讲闽南话者为主。不过,具体的证据呢?宋燕鹏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数据。他的研究,除了史料上的新颖外,更是精致化了马来西亚的华人研究,因为这是从官方档案中无法获得的资讯。

八篇论文中,有四篇是谈论与宗教相关,佛教的有佛教僧侣、佛寺和佛寺的公益活动;道教或民间的则谈论九皇爷的巡境。宋燕鹏开始书写佛教,实属缘份。热爱古籍的他在马大东亚图书馆整理线装书时,无意中发现了“融熙”法师的印章,于是就开始了追溯,开启了他系列的佛教论文。他对九皇爷巡境的论文,则是跨越传统文献及档案史学的尝试。

整本书轻松易读的部份是他在附录中所收录《光华日报》、《南洋商报》和《东方日报》所发表的书评。在他所选录的六篇书评中,竟然有四篇是谈论杜忠全之著作。杜忠全的文字中有他的情感,勾起了他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宋燕鹏,中国河北人,在马来西亚赤道线上,阅读马来西亚赤道上的故事,却想起了他北方寒冷的冬天。传统上,南洋文人的北望是文化归根的符号;宋燕鹏的闽南思北别具意义。



我在马大就读研究所时就受训使用英方档案建构历史，习惯站在政策面或政局面向思考历史问题。在阅读《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时，好奇的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如，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而建立亭主制，过后亭主的功能式微，这与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是否有关？以我研究的霹雳州为例，英政府在郑景贵和陈亚炎过世后就不再委任新的华人甲必丹，因为英殖民政府的官僚体制已相较完善。到了1921年，英政府再次在霹雳恢复甲必丹这个头衔，并封郑太平为华人甲必丹，这与当时的政局变化关系密切。荷兰，过后的英国殖民政府对马六甲的管理方式是如何的？当官僚体系更为完善时，甲必丹或亭主的功能和角色是否就相较不重要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得使用不同的材料切入探讨，这就留给后面有心人了。